

[国际学术丛刊]

差異 | Difference

金惠敏 / 主编

第 1 辑

河 南 大 学 出 版 社





[国际学术丛刊]

差異

Difference

第 1 辑

金惠敏 /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差异/金惠敏主编.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9
(2004.01重)
ISBN 7-81091-121-X

I. 差… II. 金… III. 东西文化一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2504 号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王刘纯

责任校对 聂宇峰

责任印制 苗 卉

整体设计 张 胜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64669(事业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E-mail:bangong@hupress.com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80 千字 印 数 1001—2500 册

ISBN 7-81091-121-X/I·199

定 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差异》编辑委员会

主任 汝信 关爱和

成员 (按拼音排序)

陈筠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成中英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

Aless Erjavec 斯洛文尼亚文理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

杜维明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教授

Günter Figal 德国弗莱堡大学哲学一系主任, 讲席教授

关爱和 河南大学校长、教授

Wolfgang Iser 美国尔湾加州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系
教授

金惠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Anton Friedrich Koch 德国蒂宾根大学哲学系讲席教
授

Dietmar Koch 德国蒂宾根大学哲学系副主任

马小泉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J. Hillis Miller 美国尔湾加州大学杰出教授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

王刘纯 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编审

Gabriele Schwab 美国尔湾加州大学批评理论研究所
教授

田辰山 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政治学博士

张云鹏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编 金惠敏

副主编 张云鹏

前　　言

从文艺复兴一路走来的现代化,特别是作为其当代形态的全球化运动,将如何与传统对话、如何与他者相遇凸显为我们时代的两大人文思想主题,其一纵一横甚至构成了我们整个的理论世界以及生活世界。

上世纪初叶,河南大学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古城开封之有清贡院旧址呱呱坠地。其诞生,在今天看来,正是对于我们无法拒绝的现代化的积极回应,是古老中国寻求与他者对话,并在此对话中重新定位我们自己文化传统的思想尝试。随后近百年的发展,河南大学不负历史重托,在中国历史、考古和文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并为中外文化交流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为响应时代的哲学召唤,为推动国内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为光大本校的优秀传统,河南大学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差异》国际人文学术丛刊。凡不违这一宗旨的一切人文思想类研究成果均在欢迎之列,同时我们更期盼具有国际意义的前沿、精深和原创的专题论著。

《差异》倡导“新对话”主义,既“求同”,更“存异”,不在“求同”中抹杀差异,而是将“求同”视为“理解”,因此我们所谓的“对话”就是理解差异,宽容差异,让差异成为我们思想的活水,让差异成为我们生活的镜鉴。在新对话主义看来,德国哲学的“主体向性”必须改写为“他者间性”(inter-otherness),因为只有做到了互为他者,互为主体才能真正实现,否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孔夫子之“克己复礼为仁”者,其此之谓欤?

《差异》的新对话主义无非表明了一个最基本的学术原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过这不能止步于其纯粹的方法论意义,而是更应当成为一种本体论。差异本是世界的原生态。差异作为

方法,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差异这一世界的原生态。

让我们以自己的差异、个性相会于我们共同的《差异》。

这就是我们向海内外学界朋友发出的郑重请柬。

编者

2003年9月6日

目 录

前言 (1)

本辑特稿

中西会通 夏戛独造

——纪念一代宗师贺麟先生 (中国)汝 信(1)

后现代性与中国传统

孔子思想与后现代主义 (中国)金惠敏(7)

现代中国与后现代西方 (美国)郝大维(41)

从差异到互补:西方与中国研究的互动 (美国)孙康宜(51)

儒教复兴与女权主义 (美国)玛丽·菲力普斯(59)

启蒙反思

后期现代主义 (美国)弗·杰姆逊(67)

启蒙的后果 (美国)安·卡斯卡迪(79)

启蒙运动、辩证法和哈贝马斯 (美国)田辰山(123)

阿多诺与海德格尔: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斯洛文尼亚)阿·艾尔雅维茨(137)

法国理论

- 重复与差异 (法国)吉尔·德勒兹(150)
黑格尔、人类、历史 (法国)乔治·巴塔耶(176)
耗费的观念 (法国)乔治·巴塔耶(193)

学术访谈

- 生产力与交往 (德国)哈贝马斯(207)
嗜好诡秘——德里达回忆录 (法国)德里达(220)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与复调性 (原苏联)巴赫金(238)

古今书评

无边界的帝国

- 迈克尔·哈尔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帝国》
..... (德国)阿隆·布佐加尼(247)

海德格尔思想的东方光芒

- 赖·迈:《来自东方的光芒:东亚影响下的海德格尔著作》 (德国)费安德(253)

摆脱“宿命”的技术批判理论

- 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
..... (中国)陆俊(258)

古代注疏学的传世经典

- 郑玄的《三礼注》 (中国)王启发(262)
杨亨寿重编本法式善《梧门诗话》跋 (中国)蒋寅(266)

著译者简介 (269)

英文要目 (271)

编后记 (272)

·本辑特稿·

中西会通 夏夏独造

——纪念一代宗师贺麟先生

◎(中国)汝 信

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贺麟先生逝世已经十年了，今年又适逢他的一百周年诞辰，哲学界同仁集会纪念他，缅怀他对我国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缅怀他在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翻译方面的丰功伟绩。作为他的学生，不能不回想起上世纪50年代在他门下攻读研究生时耳提面命、亲受教诲的情景，更增强了我对这位哲学界一代宗师的景仰之情。

贺麟先生(字自昭)在我国老一辈哲学家中是较早接受系统的现代哲学教育的学者。他早年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曾师从梁启超学习中国传统哲学，向吴宓教授学习翻译。1926年，他赴美国留学，在奥伯林大学哲学系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后又去德国柏林大学继续深造，直至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他激于爱国热情中止学业回国工作。他在国外求学期间，广泛涉猎各个西方哲学学派，并在怀特海、哈特曼等著名哲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对西方哲学的历史和现状都有深入的研究。回国后他一直活跃在我国学术界，在哲学园地上辛勤地耕耘，努力开展哲学教学和研究，桃李满天下。他组织和领导西方哲学名著的翻译工作，孜孜不倦地劳作，六十年如一日，对我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哲学事业的专注和执着，真可以说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学贯中西，哲学造诣精深，学识渊博，学风严谨朴实，对后辈热情培养扶植，诲人不倦，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都堪为我们学习的楷模。

在我国哲学界，自昭老师素以精通西方哲学见长，但他的研究目的始终非常明确，他决不是单纯地为研究西方哲学而研究，而是

为了以西方哲学为借鉴，吸取其优点和精华，用以充实和改造中国哲学，力求达到二者的融会贯通，探寻一条创造性地发展中国哲学的新路，以弘扬祖国的民族文化。自从19世纪西方列强用大炮强行打开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国门之后，包括哲学思想在内的西方文化也涌入中国，与中国传统学术发生了冲撞。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就意识到，需要通过研究和通晓西方哲学，才能为中国哲学谋求新的发展。例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明确指出：“苟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此。异日昌大我国固有之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哲学辨惑》）我国许多有成就的老一辈哲学家正是这样走过来的，自昭先生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还在国外留学期间，他就从事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回国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西方哲学的研究、讲授和翻译工作上，同时致力于中西哲学的融会和结合，试图创造他自己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我曾听他讲述过关于建造这一体系的宏大构想，由于当时历史的原因，他未能完成把中西哲学的一些重要思想派别熔于一炉、推陈出新的宏愿，但他指明的通过中西哲学融会贯通来发展我国哲学的道路，至今仍对我们具有启迪意义，也是有待我们后辈继续努力的。

研究和借鉴西方哲学，首先要解决对它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只有正确地对待它，才能为我所用、有所得益。从根本上说，这涉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是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中国人站在固有文化的立场上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人们提出了种种方案和理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等等。贺麟先生对以上这些理论一一进行批评，他的批评切中要害，指明了这些理论的谬误和站不住脚的方面，同时也阐述了他自己关于中西文化交融发展的见解。

贺先生从辩证法的观点出发，认为文化是有机的统一，其体和用必然合一，而不可分离，“凡用必包含其体，凡体必包含其用”，“没有无用之体，亦没有无体之用”。正因为无论事实上、理论上体用都是不可分离的，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他指出，过去中国人研究西方学术时的根本缺点就是往往抱偏狭的实用态度，总是偏于求用而不求体，注重表面，忽视本质。这样就把有机的统一整体弄得支离破碎，只能学到西方文化的一

些皮毛，而无法理解其精神实质。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研究和介绍西方文化时“须得其体用之全”，能得其整体，才算得对那种文化有深刻彻底的了解。贺麟先生认为，这并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恰恰相反，他是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的。在他看来，要想把西方文化全盘移植到中国来，将中国文化的一切都加以西方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假如真的实行全盘西化，中国就将失去其民族精神，文化上中国将沦为异族文化之奴隶。所以他提出必须反对被动的“西化”和奴隶式的模仿，而赞成主动的“化西”，即在深刻彻底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自觉地吸收融化，超越扬弃现有的西方文化。他也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说法，主张要摆脱这种狭隘的文化观念，开阔视界，因为文化是人类的公产，为人人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不能以狭义的国家作本位。因此，他提出，既要反对全盘西化，也要反对“残缺地保守固有文化”，应该“以自由处主的精神或理性为主体，去吸收融化，超出扬弃那外来的文化和已往的文化。尽量取精用宏，含英咀华，不仅要承受中国文化的遗产，且需承受西洋文化的遗产，使之内在化，变成自己的活动的产业”（《文化与人生》）。贺先生在解放前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虽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当时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的论争中确实表现得卓而不群，比其他论者要高出一头，他的一些主张在今天看来也仍包含着不少真知灼见。

贺麟先生毕生做学问，一辈子和西方哲学打交道，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始终信守着他以上的主张，就是以自由自主的精神去吸收融化西方哲学中的精华，尽量取精用宏，含英咀华，加以消化而变成自己的思想成果。特别是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后，他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研究西方哲学，取得了远远超过以前的学术成就，对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西方哲学领域内，他涉猎极广，对许多西方著名哲学家的思想和学说都有专门的研究，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在我国哲学界，贺先生是人所公认的黑格尔研究权威。他从早年起就对黑格尔哲学感兴趣，后来又对深入研究黑格尔倾注了毕生的精力，黑格尔哲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和发生影响是和他孜孜不倦的努力耕耘分不开的。可以说，贺先生的黑格尔研究是他的学术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哲学业绩。那么，他对黑格尔研究有哪些具体的建树呢？

第一，在国内，贺麟先生是第一位真正全面系统地深入研究过

黑格尔哲学的学者,从他的《黑格尔哲学讲演集》和在各个大学的讲稿中可以看出,他确实做到了“得其体用之全”、“得其整体”,对黑格尔哲学有深刻彻底的了解,他的许多精辟的论点和见解正是以他对黑格尔哲学整体的这种深刻彻底的理解为基础的。黑格尔哲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内容极其丰富,包罗万象,气魄宏大,在西方哲学史上也是少见的。怎样才能登堂入室,进入那充满思想宝藏的迷宫,怎样才能把握住黑格尔思想的整体,深刻彻底地了解其实质呢?不少研究者根据黑格尔的《哲学全书》把他的体系分为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部分依次来进行阐述,这也是通常的研究方法。贺先生则另辟途径,把精神现象学作为整个黑格尔体系的第一部或导言,以逻辑学为体系的主干,而以应用逻辑学(包括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美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等等)为枝叶。这是他基于黑格尔哲学的深刻理解而提出的新见解,是黑格尔研究中的创新。这种划分法突出了精神现象学在黑格尔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重要意义。从精神现象学入门,不仅能使人更容易理解黑格尔哲学的整个体系,而且能更真切地把握其精髓——辩证法。

第二,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贺先生以对其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的精湛的研究闻名,而在他学术活动的晚年又在我国率先进行黑格尔早期思想的研究。正是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地亲自动手翻译,推动了我国学术界对黑格尔早期著作的研究和重视,弥补了黑格尔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空白。黑格尔早期思想内容非常广泛丰富,可以说是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形成过程的一把钥匙,但在贺先生着手研究之前在我国却鲜为人知。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他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从国外收集有关黑格尔早期思想资料的情景。通过他的研究,我们开始认识到一个崭新的青年黑格尔的存在,那是一个深受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批判基督教权威、主张社会政治改革、对资本主义制度矛盾进行深刻反思的黑格尔。尤其是他剖析了过去很少有人关注的青年黑格尔的经济思想中关于劳动与异化的学说的重大意义,充分揭示出这一学说所富有的批判精神。贺先生还批评和纠正了一些西方学者对青年黑格尔思想的不正确的解释,恢复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他对狄尔泰、克朗纳和卢卡奇等人的青年黑

格尔研究的评价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

第三，贺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讲解始终紧紧抓住辩证法这一核心，早在 1936 年他在鲁一士《黑格尔学述》一书译序中指出，“黑格尔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他那彻始彻终贯注全系统谨严精到的哲学方法，——这就是他的矛盾法（普通一般人皆采日译作辩证法……）”。他曾多次说过，黑格尔哲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体系，而在于方法，即辩证法。他在谈论精神现象学时就指出：“贯穿精神现象学的方法，是分析精神现象、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内在矛盾的辩证法。而这一成果也是整个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最后成果。”他讲黑格尔的逻辑学、自然哲学、法哲学、艺术哲学、哲学史等等，也总是着重探讨其中的辩证法思想。他讲的黑格尔辩证法不是干巴巴的几条抽象的原则或规律，而是生动具体、有血有肉、推动世界和事物发展的创造性力量。由于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他的研究成果也对广大读者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贡献。

以上几点只是一鳞半爪，贺先生对黑格尔研究的贡献还远不止此。特别应该补充的是，他对黑格尔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所做的巨大贡献。黑格尔著作向以艰涩难懂著称，翻译之艰难不亚于专门的研究。翻译《早期神学著作》、《精神现象学》、《小逻辑》、《哲学史讲演录》等名著花费了贺先生的大量精力，正是通过他的流畅的高质量的译文，使我国广大读者得以认识到黑格尔哲学的原貌，这真是功德无量的一项学术业绩。

在自昭老师的学术生涯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由一个唯心论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解放前的中国哲学界，他是以真诚地信奉唯心论闻名的，曾被誉为“中国的费希特”。新中国成立后，他通过亲身的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经过痛苦的思索和自我批评，他毅然放弃长期信奉的唯心论哲学，而皈依马克思主义。特别令人感佩的是，他以 80 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历尽坎坷而终于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光荣的一员。为了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他多年来进行认真刻苦的学习，钻研经典著作，翻译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哲学一般的批判》，真可谓字斟句酌。像他那样认真对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少有的，令我们这些学生后辈感到惭愧。贺麟先生对真的无私的追求，不断进行探索和

创造，与时俱进的精神，正是我国老一辈优秀知识分子代表身上最可贵的品德，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向他努力学习的。

·后现代性与中国传统·

孔子思想与后现代主义

——以主体性和他者性而论

◎(中国)金惠敏

内容提要:与现代性西方在自然的征服中、在人的自然欲望的膨胀中建构主体性的方式完全不同，孔子指明了一条别开生面的主体性建构之路：克己，虚我，爱人，换言之就是，主体性在对他异的承认、参与和责任承担中完成其自身的建构。而这同时即意味着不绝对化自我，不绝对化、神圣化和本体化自我所认定的目标，相反在一个永远没有完结的与他异的相互作用中趋向一个不能预先确定的主体性。

谁曾料想在主体和主体性问题上中国思想文化界会经历如此剧烈的逆转：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我们一直都在热切地呼唤、在殚精竭虑地建构主体和主体性理论，——那是思想解放浪潮最美丽的一朵浪花。先是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其中例如我们把美当做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是说，美是主体性或人性的集中表现；再是沉潜良久而终于在这场讨论中浮出水面的依据康德而建立主体性的尝试；推而广之，在文学批评领域对于重振作家主体性和作品自主性的殷殷之情；最后是那场意外地流产了的对“五四”运动70周年的纪念，即纪念其民主和科学的理性精神。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的登陆似乎一夜之间便改写了我们对于主体性的十数年的执著诉求：往好处说，主体性被作为一个陈旧的话题而冷落了，——90年代早期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小小插曲；往坏处说，主体性成了当代社会各种弊端的罪魁祸首，甚至是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同义语。

当然，这一认识的转变并不完全是由于后现代主义视角的介入，因为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新潮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五四”

精神的质疑和挑战,但是其所直接意识到的和谋求着叛逆的对象则是仿佛与“五四”毫不相涉的“文革”理式,即主体性的而同时又是个人意志的、理性的而同时又是专制的、激情的而同时又是空泛的、崇高的而同时又是非人性的。对后一方面的批判我曾经认为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继续和深化,也就是说,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原初动机在于推进一个现代性的计划。而进一步的思考却反过来指向前一方面,即现代性本身以及“五四”以来启蒙主义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这里我是把“文革”理式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一个结果来谈论的。80年代末期有批评家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浪文学新潮例如实验小说的后结构主义踪迹,但是其所关注的问题一如其所评说的作家作品之公开或隐秘的述说是纯粹文学性的,即对于无论是经典现实主义或所谓革命现实主义均呈异质性的一些形式因素,如修辞、语态、叙事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再现危机等等。只是到了1991年以后在我陆续发表的以“后人道主义”为总题的系列文章里,这类文学探索的文学史意义才被特别地彰显为思想史的意义,好像因为一场“政治风波”而中断了的主体性研究才被接续起来,但其所代表的已经不再是对过去的恢复而是一个反思并且由这一反思而进入一个新的理论时期。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性运动是由西方世界所发动而推向全球的现代性运动的一个部分,同样90年代以后我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也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再检视的一个东方回应。我之所以一直坚持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仍然是本土性的,乃是由于在考虑到中国的不充分的现代性的同时,认为第一现代性的任何实现一方面呈现为差异性,另一方面也潜在地决定于其共同性,因而第二对现代性之共同性的反思也同时是对我们自己历史经验的省察。既然现代性在中国已经是一个作为进程的历史事实,那么反思现代性就不仅是一个历史的亦即现实的内在欲求,而且也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过度现代性建立一个预警机制。现代性绝非如启蒙主义者所幻想的那样是一个绝对的价值,只要其被施之于行动,其偏离就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我们甚至可以说,反思现代性未必要等到彻底现代性以至于过度现代性出现的那一天,或者干脆说,现代性在其诞生之日,假定有这么一个绝对起点的话,即意味着后现代性的必然以及合法性。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哲学上争衡的焦点是主体性及其与他异